

语义成分分析研究概览

苏军锋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语义成分分析发端于音系学领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的产物,更是分析意义的一种重要工具。通过回顾这一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历程,选取有代表性的论著和论文,简要分析其应用过程和功能,同时也指出该方法的优点与不足。

关键词:意义;成分分析;语义学

中图分类号:H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6)03-0063-05

一、语义成分分析法的涵义

语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又叫做义素分析(sememe analysis)。《劳特利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在讨论语义关系时认为,单个语言表达与(所有)其他表达的语义关系,以及一门语言词汇的语义结构可以通过逻辑运算来做出描述,而相应的描写方法和描写语言取决于它们各自所依据的理论,例如在结构语义学中,语义成分分析里所用的语义特征,或者生成语义学框架下,引入的基础表达(语义原子)和意义假设^[1]。根据克里斯托尔的《语言学和语音学辞典》,语义成分分析法宣称所有的词项都可以通过使用一系列有限的成分(或语义特征)而得以分析,这些成分可能是普遍的;至于成分,就是词项意义的无法再分解的特征,例如“女孩(girl)”可以分析为“人类”“女性”和“儿童”等三个成分^[2]。《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认为,成分分析在语义学中是研究意义的一种方法,即把一个词分析为一系列的意义成分或者语义特征;而在语言学里,它是可以分析任何语言单位的一种方法,但通常是将词语或者语音分解为更小的部分或成分^[3]。《牛津简明语言学词典》认为语义成分分析是针对词义的研究,其中每一个单位的意义通过一系列语义特征或成分与其他单位的意义相区别^[4]。

王寅编著的《简明语义学辞典》认为,成分分析法在语义学中是指把词的义项分为若干最终对比成分的一种分析方法,通常采用对分法(binary opposition)对词项典型的、区分性的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进行分析和描述^{[5]56}。《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认为成分分析指把语音或词分析成其组成成分的语言分析方法,例如把音位分析为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在语义学中有时亦作义素分析,即把一个词的意义分成最小成分的过程^[6]。根据《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义素也叫语义原子或语义成分,是把词的意义分解后所得到的语义特征,在职能上相当于语音学中的区别性特征;而义素分析法又叫语义成分分析,其基本论点是所有的实词意义都可以分解为一些语义成分即义素,而这些语义成分可以系统地分类^[7]。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语言学名词》认为,“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又称‘义素分析法’。把词的义位分割为若干最小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分析其聚合关系的分析方法。是结构语义学的对比原则在语义研究中的运用,主要采用对比的方法,找出某一义位的义素结构式”^[8]。

从上述定义可知:对于什么是语义成分分析,国内外语言学界取得了共识,不存在争议;它围绕不可再分的义素、成分、语义原子等而展开分析;

收稿日期:2016-06-1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12)

作者简介:苏军锋(1976—),男,山西芮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它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物,但为多数语言学流派所接受;国内语言学界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一方法的使用;语义成分分析可以用于语义学、音系学以及相关的场域之中;尽管历史悠久,但它依然有发展应用的空间。

二、语义成分分析法的产生与发展

从字面意义以及起源方面来看,英语的 componential analysis (CA),应该汉译为“成分分析(法)”,最初是被用于音系分析的,即音系学家从物理学得到启示,因为在物理学中,曾被看做自然界里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单位——原子,可以进一步分为质子和中子。于是,音系学家将语音,尤其是音位,分解为许多不同的最小语音单位,即具有“+”和“-”或者“正”与“负”或“有”与“无”的特征。这种分析法后来逐渐影响到了语义学领域,又几乎同时发展于欧洲和美国:在欧洲,它通常被称为义素分析,而在美国,它一般被叫做成分分析。

20世纪40年代,丹麦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首先提出词义可以再分的假说,即将音系研究中的分解法,用于语义研究,进而建立了义素分析理论。正如威尔斯所说,语义成分分析起初采用了结构主义音系学的方法论模式,即每一个音位都是一束区别性的正负特征的集合,而且每一个词都是一系列音位按照具体规则进行音位组合而形成的^[9]。可见,它从音系学进入到语义学,成为区分处于意义领域(语义场)的词语以及研究同义词的重要工具^[10]。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隆姆菲尔德于1955年提出“语义特征”这一术语,但没有将其升华为成分分析法。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古迪内夫和朗斯伯里等学者,受到雅各布森提出的音位学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分析方法的启示,在研究亲属词的含义时提出义素分析法,尽管戴维斯和瓦尔纳早在1937年研究亲属关系时就做过类似的分析^[11]。20世纪60年代,兰姆、奈达和本迪克斯等进一步发展了语义分析理论,从而开辟了语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至此,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意义分析的有力工具,尤其用来分析词语的指称意义^[12],即将“词项分解为意义的基本元素”^[13]。它也被称为语义成分分析、特征分析(feature analysis)、义素分析或词汇分解(lexical decomposition)。

总之,从上世纪30年代起,成分分析的几个变体便独立地发展起来,而最知名的是Katz和Fodor于1963年在生成语法框架下提出的。他们认为,像“bovine(牛的)”“adult(成年)”“male(男性)”等成分是独立性的普遍存在^[4]。具体而言,语义成分分析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假设一个词的意义可以分解成更基本的意义成分,即义子、语义特征或语义标记。通常,这些基本的意义成分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描述,如下所示:

(1)“丈夫”= +已婚, +男性, +成年, +人类

(2)“女人”= +女性, +成年, +人类

凭借这些方法,某个词的基本意义成分就变得清晰起来,而且词语之间的语言差异可以被描述清楚。

三、语义成分分析法的应用

如上所述,成分分析发端于音系学领域,后来扩展到语义学领域并在其中得到大量应用。这里我们选择国内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管窥其具体的运用过程与功能。

著作方面,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以义素分析作为现代语义学的三个关键问题之一,详细介绍了国外的义素分析法即语义成分分析法,并且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将该方法与汉语传统语言学的词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11]。作者的研究简单而实用,可以使义素分析法超出有限的范围,克服分析得过于简略乃至主观随意的弊病。金立鑫在其编著的《语言研究方法导论》中把义素分析看做语义分析的重要工具而加以介绍。他认为义素分析是科学定义的一种转写形式,是分析描写词义不可或缺的方法^[14]。李葆嘉的《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初步建构了析义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新界定了义征的性质,阐述了词汇语义分析的个人主观性与社群主观性的关系;同时,基于义场建构与义征挖掘的互动,细化了义征提取步骤、层级标注和评估方法等操作程序^[15]。这些工作凭借的理论工具,主要就是语义成分分析或曰义素分析。曹伟在其撰写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义素分析作为语义分析最重要的方法而加以介绍评价。他详细讨论了义素分析的三个具体步骤(例如确定语义场等)和两大描写方式(例如语义矩阵图)^[16]。陈保亚在《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中专辟一节,讨论

了语义特征研究。他回顾了卡茨(Katz)、王士元、乔姆斯基(Chomsky)等重要学者的贡献,海外汉语界邓守信、汤廷池等的研究,以及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17]。

论文方面,张晰完整地综述了国外语言学界语义成分分析的提出、理论基础、实用价值、批评与反批评等重要议题^[18]。施兵对语义成分分析法在解释词汇和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判断词语的可接受性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介绍,指出这一分析法仍存在主观臆想性及不能分解抽象概念等问题^[19]。李文玲探讨了语义成分分析中各成分间的关系议题,认为语义成分之间既有显著性顺序问题也有一定的层次关系^[20]。刘强认为通过词汇教学中语义成分分析法和语义场理论的应用,可以使学生了解英语词汇系统内部的各种语义关系,从而增进学生对词汇的分析理解能力,帮助他们扩大词汇量并且提高对词汇学习的兴趣^[21]。李毅讨论了基于标注语料库的语义成分研究:在语义成分研究现状综览的基础上,涉及语义成分的界定及其标注、语义成分特征的描写、语义成分同现句法分布考察、语义成分与句法成分对应关系的分析等内容^[22]。颜红菊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讨论了语义成分的原型属性以及语言不同层面的具体表现,认为语义成分分析法不仅是一种词义分析方法,更能对语言形式提供语义解释^[23]。张良林试析了语义成分分析法的意义,认为成分分析法能够清晰地揭示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探讨句法或词形学过程背后的语义理据,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语言中普遍的心理概念结构,是相对于指称论的一大进步^[24]。魏晓斌讨论了语义成分分析法的瑕瑜,认为它可以使人们洞察到词义的微观结构,对词义研究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作为结构主义的产物,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不足^[2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讨论了语义成分分析法在翻译中的具体应用问题。

四、语义成分分析法的优点与不足

传统语义学曾把一个词的意义看作是分割的分子概念。然而,随着结构主义的出现,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将词的意义分割为更小的语义成分单元,是可能而且合理的。他们开始研究词义的区别性特点或特征集,这种流行的特征研究以及现代语言学中的语义场研究,极大地帮助成分分析这一方法从音系学走向语义领域。此

后,作为通过意义成分而描写语言中词语的手段,成分分析法在20世纪60到70年代最有影响,代表着语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一方面,语义成分分析法具有自身的优点。例如金立鑫认为义素分析非常有助于科学定义,而且比定义更为直观和形式化,在操作上容易实现规范;义素分析也比较容易看出一组词之间在语义上的关联程度;此外,义素分析还有助于考察同义词和反义词之间的语义差别,而更重要的是,义素分析还可以帮助我们对句子进行语义描写^[14]。王寅也认为,它具有这样的优点:义素是具有典型的、区分性的语义特征,是对人类经验的一种抽象概括,具有普遍性;义素属于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可用其来描写任何自然语言中词的意义,便于计算机识别和翻译语言;用少量的义素就可公式化地定义许多词,具有经济性;克服给词义定义时常出现循环论的现象^[12]。我们则认为语义成分分析至少具有以下几条优点:

第一,它可以帮助人们如何看待构成世界的身边事物,因为它与我们的直觉紧密相连。例如,人们直观地知道“单身汉”意味着未婚、男性、成年和人类;“女人”的意思是女性、成年与人类。因为是直观性的知识,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很容易地掌握单词意义。

第二,它很好地处理了词汇关系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上下义关系和同义词关系。“当一个词语形式的意义包含在另一个的意义里时,这一关系即被描述为上下义关系;一些典型的例子有水仙花与花、狗与动物、胡萝卜与蔬菜、榕树与树等”^[26]。既然它主要被人们用来分析词义,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词与词之间的上下义关系,例如:

(3) asp(角蛙)

(4) snake(蛇)

(5) animal(动物)

在把“asp(角蛙)”的词义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后,人们会发现其中的是“蛇”和“动物”。因为蛇和动物是“asp(角蛙)”意义的组成部分,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某生物可以被称为“asp(角蛙)”,那么它也可以被称为“蛇”或者“动物”。对“asp”的成分分析表明:它的意义包括“蛇”和“动物”的语义成分,这些成分分别来自“蛇”和“动物”的语义。也就是说,“蛇”和“动物”是“角蛙”的两个上义词。至于同义关系,同

义词“丈夫”和“已婚男人”可为例证。如果对他们进行成分分析,即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丈夫”分解为结婚的、成年、人类和男性等四个义素。“已婚男人”意义的获得,则通过分别分析“已婚的”和“男人”——“已婚的”可以描写为结婚的,而“男人”则解析为成年、人类和男性。把“男人”和“已婚的”的语义成分结合起来,就得到“结婚的”、“成年”、“人类”和“男性”。一句话,现在“丈夫”和“已婚男人”分解为同样的义素,于是它们的含义相同:二者是同义词。

第三,它也可用来分析相同语境下的句子之间的意义关系,例如:

(6) My teacher is a husband (我的老师是一位丈夫)。

(7) My teacher is a woman (我的老师是一位女性)。

很明显,(6)和(7)互相矛盾,这意味着二者不可能在同一语境下都为真。从(1)和(2)中“丈夫”与“女人”的定义来看,矛盾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这两个词的构成元素。在语义成分分析的视角下,“丈夫”的意义之一是“男性”,而“女人”的意义之一是“女性”。显然,根据人们的常识,“男性”意思是“非女性”而“女性”指“非男性”。所以,二者是相互矛盾的,这两句话的意义因此也是矛盾的,因为其中的一个句子含有某些元素,而另一个句子则含有对这些元素的否定。总之,语义成分分析不仅可以在超语境的意义上来分析某单词的意义以及词间关系,而且可以用来在语境意

义上识解(construe)句子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语义成分分析法也有其固有的不足之处。语言学家对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及其在语义中的应用存在诸多争议。例如莱昂斯认为,在挑选、分析和排列共同语义成分方面,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27]。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与音系中数量有限的音位相比,义素简直和单词一样之多,即“究竟有多少语义特征尚无法确定”^{[5]56}。而随着新词的生成,义素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尽管有一些语言学家,例如威尔兹彼卡,致力于找出所有语言中通用的语义成分^[28],但“到底需要多少义素才能把义素系统建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令人气馁的”^[14]。此外,它必须基于语义成分的基础而实施,而语义成分又应该是它自身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利用它的结果来对它进行分析,这是一个两难的循环问题。对此,莱昂斯明确地说,“我们无法避免这样的疑虑:语义成分的解释是基于语言学家对词项的直觉性理解”^[29],然而“语义特征分析具有主观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分析方法”^{[5]57}。例如,当它用来预测“马”的含义时,它被一些语义学家分析为:马 = + 动物, + 马科的^[30]。“马”的定义包括“马科的”,而后者本身又应该被分析为“与马有关的”。因此,“马”的解释应该用其本身来解释,这导致了可笑的循环。可见,它不能被用来分析词语的所有关系。例如,当它被用来处理例如“父母”与“子女”反义词时,的确难以通过寻找共同的语义成分来区分二者。

参考文献:

- [1] Bussmann H.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422.
- [2] Crystal D.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6th Edition) [Z].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8:95.
- [3] Richards J C.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4th Edition) [Z]. London: Longman (Pearson Education), 2010:106.
- [4] Matthews P H.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3rd ed.) [Z].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70.
- [5] 王寅. 简明语文学辞典 [Z].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6] 戴炜华. 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 [Z].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169.
- [7] 唐作藩. 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7:702.
- [8]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语言学名词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75.
- [9]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1982:74.
- [10] Meier G F. Innersprachliche und Konfrontative Polysemie [J]. Zeitschrift für Phonetik, Sprachwissenschaft und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1978(31):143-150.

[11] 贾彦德. 汉语语义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55.

[12]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第二版)[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211-212.

[13] Hatim, Basil.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M]. London &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Books Ltd. , 2013:229.

[14] 金立鑫. 语言研究方法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175, 302-303.

[15] 李葆嘉. 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16] 曹伟.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17] 陈保亚.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18] 张晰. 关于语义成分分析法[J]. 现代外语, 1988(3):1-7.

[19] 施兵. 语义成分分析法综述[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2003(4):130-133.

[20] 李文玲. 语义成分分析探微[J]. 外国语言文学, 2004(4):21-25.

[21] 刘强. 语义成分分析与英语词汇教学[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6):156-160.

[22] 李毅. 基于标注语料库的句子语义成分研究[D]. 烟台:烟台师范学院, 2005.

[23] 颜红菊. 认知视角下的语义成分分析法[J]. 湖南大学学报, 2009(3):96-100.

[24] 张良林. 试析语义成分分析法的意义[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0(3):127-131.

[25] 魏晓斌. 语义成分分析法之瑕瑜辨析[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0(5):51-55.

[26] Yule, George. The Study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119.

[27] Lyons, John. Semantics (vol. 1)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8] Wierzbicka A. Semantics, Culture and Cognition:Universal Human Concepts in Culture-Specific Configurations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9] Lyons John.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480.

[30] 束定芳. 现代语义学(第二版)[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67.

An Overview of Studies on Componential Analysis

SU Ju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Originated in the field of phonology, componential analysis (CA) is the outco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an instrument of analyzing meanings. This paper, based on CA’s emergence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selects some representative academic works and papers, attempting to analyze its applications and functions. Meanwhile, its merits and demerit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meaning; componential analysis; semantics

(责任编辑:沈建新)